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秋季号

Autumn, 2012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2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2 年秋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309-09636-1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482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2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罗 兰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9.75 字数 330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636-1/H · 2069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曲卫国

本期执行主编:曲卫国

本期栏目负责:

文 学:张 冲

语言学:曲卫国

翻 译:何刚强

本期编辑:

罗 兰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陈 靛

褚孝泉 何刚强

姜 宏 姜银国

李 征 陆谷孙

曲卫国 沈 黎

沈 园 谈 峥

唐 敏 汪洪章

王建开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朱永生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 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友情、合作及影响的焦虑 陈后亮(3)
- 政治互文下的《比萨诗章》 郭英杰 王 文(9)
- 和尚的身体奇景与池尾寺内的微观政治——芥川龙之介
《鼻子》新论 李 征(15)
- 巴什拉物质想象论观照下的“玫瑰”文学 张璟慧(22)
- 论阿格妮丝·赫勒的情感现代性理论及其文学批评 傅其林(27)
- 《劝导》中的变与不变 苏耕欣(32)
- 《米格尔街》中的人们:理想的卑微与突围的窘境 孙桂荣(37)
- 爱默生的早期进化思想 夏 睿(41)
- 情节表象之下的语篇实验——唐·德里罗的小说《名字》的
深层主题研究 毕建程(47)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 《诗经》章句结构中的共下义词 曾建彬(55)
- 语用学研究的新领域——语篇语用学 姜望琪 李寒冰(61)
- 有关日语“A连用形+Vすぎる”结构使用特征的研究 杨晓敏(68)
- 医学符号学视阈下的疾病认知表达机制 李定钧 孙庆祥 蔡和兵(75)
- 《红楼梦》中家庭称谓语的概念范畴考察 张 俊(81)
- 《牛津英语词典》的“阅读计划”:前默里时代 秦晓惠(87)
- 规范与变异,能产与创造——再论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 冯 奇 万 华(94)
- 语类对多模态新闻图片选择的制约 辛君珺(101)
- 韩汉语人称代词的省略现象探究 金顺吉 鹿钦侯(108)
- 韩语对话文本的主格助词研究 韩香花(116)
- 从认知语法角度探讨名转动词的意义识解 赵 静(122)

翻译研究

- 起笔质直求真 文成瑕瑜互见——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研究
..... 张德福(131)
- 翻译之计,在于平衡——谈文学翻译的策略抉择与调和 张晓雪(141)

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友情、合作及影响的焦虑

陈后亮

摘要：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熟知的深厚交往和密切合作，并且对各自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狄更斯的帮助让柯林斯的才华在短时间内快速显现，但随着后者声名鹊起，两人却都开始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影响的焦虑。如何抵制这种焦虑或许正是影响两人后期创作走向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讲述两位作家从建立友谊到关系疏远的整个历程，重点分析了友情在彼此作品中留下的影响痕迹以及随着各自文学地位的改变而造成的感情隔阂，从新的角度对两人关系疏离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Abstract: There had been a period of deep friendship and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harles Dickens and Wilkie Collins, which is often neglected in research though very influential for both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Thanks to the help from Dickens, Collins was able to realize his literary potential very quickly. With Collins' ripening day by day, however, both Collins and Dickens began to feel under the intense anxiety of influence from each other, their different reaction towards which probably was the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ed their later creation. Through a narration of the course that they became friends and parted company,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traces their friendship had left in their works and its deterioration resulted from the changes of their mutual literary achievements, so as to giv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estrangem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关键词：狄更斯；柯林斯；友情；影响的焦虑

Key Words: Dickens; Collins; friendship;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引言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和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 1824-1889)皆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著名作家，前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巨擘，后者则是当今公认的现代侦探文学之父。自从1851年初次相识之后，两人可谓一见如故，相知恨晚，在之后的1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最为密切的友谊。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段珍贵的友谊却基本上被人忽略掉了。原因主要在于，狄更斯的朋友兼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 1812-1876)出于嫉妒心理，在他写的《查尔斯·狄更斯传》(*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中有意删除了狄更斯与柯林斯交往的大部分信息，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

偶尔提及一下他，而福斯特本人与狄更斯的交情则被刻意浓墨渲染了一番。就像柯林斯在读过福斯特的《查尔斯·狄更斯传》后所讥讽的那样，其内容不过是“福斯特本人的生平，穿插着一些狄更斯的趣闻轶事”(转引自 Milley, 534)。事实上，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的关系不但非常密切，而且对彼此的文学创作具有重大影响。假如没有对方，很可能两人都不会有后来的一些重要作品。正如有人所说：“对任何一位了解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的熟悉交往程度并且研究过两人作品的人来说，他们的友谊及其对彼此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①下面本文将沿着两人从初识到关系破裂的整个历程，重点考察这段交往随两人文学成就的变化而变化的轨迹，通过讲述一段久被遗忘的有趣往事以便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启发。

^① 参见 <http://members.chello.nl/~a.vanarum8/EliotProject/Essays/secollins.htm>. (accessed 2012-4-23)

1851年3月12日,狄更斯和柯林斯在他们共同的朋友奥古斯特斯·艾格(Augustus Egg)家中相遇。狄更斯时年39岁,已经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而柯林斯却是一位只有27岁的文学青年,刚刚发表过几篇没什么反响的作品。虽然狄更斯当时在事业上正处于巅峰,可在感情生活上却深陷麻烦。他和女演员爱伦有了私情,与妻子凯瑟琳的感情基本破裂,对几个不争气的孩子也深感失望。但受道德观念束缚,他又没有勇气主动摆脱这些感情的煎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恰在此时,他从柯林斯身上一下就发现了太多让他为之振奋的东西。柯林斯出身于艺术之家,其父威廉·柯林斯是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风景画家。小柯林斯生来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美食、美女和美酒是他快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生活观念相当开放和超前。他非常蔑视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制度和性观念,公开表示不会受传统婚姻约束,也毫不隐蔽自己放荡的私生活。他认为身边的人们都太虚伪,不敢冲破迂腐的道德枷锁去寻求自己真正想要的满足。有意思的是,柯林斯的这些行为和观念非但没有引起思想保守的狄更斯的反感,反倒让他“心向往之”。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迅速发展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当时的狄更斯正在与人合办一本杂志《家常话》(Household Words),为了收集素材,他经常要到欧洲各地旅行。自从结识柯林斯后,他便把后者当成了自己最中意的旅伴。在此后几年间,两人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酒吧和沙龙等社交场所。柯林斯在旅途中不时炫耀着自己丰富的情场艳遇,这给苦闷的狄更斯增添了不少乐趣,也极大缓解了他因为对妻子的不忠而产生的自责。难怪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柯林斯在吃喝上来者不拒。我们无论在哪里都相处得很融洽,心情总是很好。”(转引自Allen,35)而柯林斯也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声称:“我们每天都见面,两个大男人之间不可能有比我们更好的友情了。”^①

除了一起旅行,狄更斯还热情邀请并推荐柯林斯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耐心地栽培这位颇具潜力的年轻人。从1852年到1859年间,柯林斯相继在《家常话》上连载发表了《巴希尔》(Basil,1852)、

《一张怪床》(A Terribly Strange Bed,1853)、《捉迷藏》(Hide and Seek,1853)和《绝对机密》(The Dead Secret,1857)等多部作品。柯林斯自身的文学天赋再加上狄更斯的悉心指导使他迅速成为惹人瞩目的文坛新秀,也让他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自信。从1853年开始,狄更斯说服自己的老板兼合伙人威尔斯,同意让柯林斯成为《家常话》的专职签约作家,并提供给他一笔相当丰厚且稳定的薪水。他在写给威尔斯的信中说:“我考虑柯林斯已经很久了,我认为我们现在能为《家常话》所做的最好决定就是邀请他加入……并且每周付给他5基尼酬劳。他非常有帮助,且能异常快速地领会我的意思。”^②

二

1858年对狄更斯和柯林斯两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柯林斯第一次搬离自己的母亲,公开与他的情人格瑞弗丝住到一起。而狄更斯也因为与爱伦的私情泄露不得不与妻子离婚。以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两人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却给两人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柯林斯无所顾忌,毫不理会流言蜚语。狄更斯却无法承受各方的指责,始终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不忠行为。非但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这惹恼了自己的老板,并最终导致他终止了与《家常话》的合作。而对狄更斯和柯林斯的文学创作来说,这却意味着新的契机。

离开《家常话》后,狄更斯在第二年即开始独立创办自己的杂志《一年到头》(All the Year Round),并邀请柯林斯加入。为了吸引读者,他决定在每一期都要连载一集由著名作家创作的小说,第一期创刊号就发表了他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在《双城记》即将连载完毕时,他又决定让柯林斯创作一部小说来接力,于是就有了后者的经典作品《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它的开头部分与《双城记》的结尾部分出现在同一期《一年到头》上。这两部小说分别都是他们被公认的代表作之一,充分展示了各自最成熟的创作水准,也让《一年到头》在短时间内创下了三倍于《家常话》的发行量,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杂志,而柯林斯也从此一跃成为在知名度上堪比狄更斯的著名作家。《白衣女人》还给柯林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他兴奋地写信告

^① 转引自 Philip V. Allingham. Wilkie Collins and Charles Dickens. <http://www.victorianweb.org/authors/collins/dickens1.htm>. (accessed 2012-4-20)

^② 参见 http://www.wilkie-collins.info/wilkie_collins_dickens.htm. (accessed 2012-6-10)

诉朋友：“5 000 英镑!!! 哈哈！仅仅用了9个月或最多不到一年就赚了5 000 英镑！除了狄更斯，还有谁能够做到这样！”（转引自 Allen, 38）自信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柯林斯开始学会跟出版商讨价还价。他也不再需要从狄更斯那里领取固定薪水维持生活了，于是在1861年1月，柯林斯正式向狄更斯提出辞呈，不再为《一年到头》专职写作，成为一名自由作家。虽然狄更斯非常舍不得放他走，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只是说：“对于我们的分手（尽管只是在文学意义上），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还会再次合作。”①

虽然柯林斯终止了与《一年到头》的写作合同，但按照此前约定，他还必须在1862年继续连载完成他的另一部小说《无名》（*No Name*）。不过天有不测风云，柯林斯的身体状况从这一年开始不断恶化，连续的写作加上毫无节制的放纵生活终于透支了他的健康，甚至到了无法继续写作的地步。狄更斯闻讯后急忙给他写信，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完成余下的部分创作。他说：“你随时可以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写不下去了，并希望我来接替，那我就会随时替你顶上……我希望这样说可以宽慰你。你只要招呼我一声，我就过去。”②不过，柯林斯还是拒绝了他的善意，独自坚持完成了余下的合同任务。

在柯林斯为其他杂志写作的几年间，狄更斯多次写信表示希望他能够重回《一年到头》，请他“永远记得……我正张开双臂期待你”（转引自 Lonoff, 160）。但两人真正意义上的再度联手是在1867年。在这一年，柯林斯有两部作品连载发表于《一年到头》，分别是《此路不通》（*No Thoroughfare*）和《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特别是后者，作为现代侦探小说公认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柯林斯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有意思的是，早在这部小说刚开始连载时，狄更斯曾称赞道：“它经过了出色而细致的酝酿，肯定会成为一部杰作。它在很多方面都胜过他此前的任何一部作品。”③然而随着连载逐渐完成，小说声誉日盛，狄更斯却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其结构让人厌倦，甚至无法忍受，其中还充斥着作者刻意要与读者对着干的傲慢和自负。”④这种态度的转变，似乎预示着两人之间在文学创作理念上已出现某种龃龉。

三

事实上，狄更斯和柯林斯除了是一对好朋友外，他们之间还有一层更不为人熟知的姻亲关系。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层关系最终成为两人友情中的阿喀琉斯之踵。原来，柯林斯还有一个小他4岁的弟弟查尔斯。查尔斯既没有哥哥的文学天赋，又体弱多病，只是一位很平庸的游记作家，但他却得到了狄更斯的小女儿凯蒂的青睐。凯蒂被认为是长得最像父亲的女儿，也最得狄更斯宠爱，可年仅20岁的她偏偏喜欢上比她大12岁的查尔斯。虽然狄更斯对这位未来的女婿很看不上眼，但迫于无奈，他还是在1860年7月同意了女儿的婚事。狄更斯始终认为女儿的婚姻是个错误，完全是在幼稚和冲动的控制下草率做出的选择。他非常厌恶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女婿，除了在自己的杂志社里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外，他对这对夫妇不愿意再承担更多义务，只是偶尔会接济一下女儿。有一次狄更斯在宴会上碰见查尔斯后，他竟然冷冷地诅咒起自己的女婿来：“你今天能到这儿来，让我感到很诧异。但或许从明天开始你就再也出不了自己的屋子了。”⑤

狄更斯对查尔斯如此厌烦，很难不影响他与柯林斯的关系，要知道柯林斯还是很疼爱自己的同胞兄弟的。但若把这当成是弄僵两人关系的主要原因似乎有点牵强。假如我们换个角度，从两人对彼此的文学成就所感受到的影响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接受与反叛的冲动出发，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友情日渐疏远的原因。

如前所述，狄更斯与柯林斯初次相遇时，他已是功成名就的文坛大家。他在柯林斯身上不仅发现了让自己十分愉悦的性情和生活态度，也发现了非同一般的文学潜质。为了栽培这位后生晚辈，狄更斯可谓不遗余力。与他们同时代的艾利扎·林顿（*Eliza Linton*）就说过：“为了自己这位年轻朋友的处女作，他（指狄更斯）可谓煞费苦心，逐行逐字地帮他审阅、修正、删减和添加内容，就像一位尽心尽力的老师正在为一位有前途的学生修改第一篇文章那么仔细。”（转引自 Lonoff, 150）虽然林顿的话有些夸张，因为柯林斯在认识狄更斯之前就已经发表过一

① 参见 http://www.wilkie-collins.info/wilkie_collins_dickens.htm. (accessed 2012-6-10)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⑤ 转引自 Philip V. Allingham, Wilkie Collins and Charles Dickens. <http://www.victorianweb.org/authors/collins/dickens1.htm>. (accessed 2012-4-20)

些作品,但也基本属实。刚开始时,狄更斯的确会认真倾听柯林斯对每部作品的构思,并且会非常巧妙地把自己的意见用鼓励的语言表达出来,避免伤害后者的自尊心。尽管如此,他的帮助还是让柯林斯深感不安,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对这些一定要严格保密……因为一旦那些温和的读者知道我曾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狄更斯听的话,那么等到作品发表后,他们肯定会说我那些好东西都是从狄更斯那里得来的。”(转引自 Lonoff, 152)很显然,这正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由于受人恩惠而产生的负债之焦虑”(哈罗德·布鲁姆, 1989: 3)。

按照布鲁姆的观点,作为“迟来者”的作家注定会焦虑不安地生活在强大的前辈作家的阴影之中,犹如儿子在忍受着父亲的压迫(哈罗德·布鲁姆, 1989: 3—15)。“儿子”在初期或许会屈服于父亲的成就威望,但能否超越父亲却是他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任务,这也正是年轻的柯林斯所面对的状况。事实上,他与狄更斯之间也的确非常像是一对父子关系,不单因为狄更斯是他弟弟的岳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心灵上彼此需要。年近半百的狄更斯无论在文学创造力还是在身体健康上都开始下滑,9个子女又都没有可以传承自己衣钵的潜质,如果身边能有一位乐意受其荫庇的年轻后生,这无疑会给他带来某种“安全感”。而刚出道不久的柯林斯自然也很愿意找到一位可以帮他成长的靠山,就好像是无助的孤儿需要父亲一样。因此,笔者非常认同勒诺夫的观点:“关于柯林斯如何取悦自己的恩师的事情,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但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某种程度上还给了狄更斯一次扮演父亲角色的机会,并由此缓解后者对自己的威望、能力和精力衰退的恐惧。”(Lonoff, 160)

刚开始时,出于对“父亲”的崇拜和讨好心理,柯林斯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狄更斯的所有建议,包括如何塑造人物,如何吸引读者等。在两人合作完成的几部作品中,包括《金玛丽的遗骸》(*The Wreck of the Golden Mary*, 1856)和《两个闲荡学徒的懒散之旅》(*The Lazy Tour of Two Idle Apprentices*, 1857)等,柯林斯心甘情愿地充当无名英雄,根本不在乎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他所得到的好处是,狄更斯的庇护和指导使他在短时间内名利双收,但他也由此失去了不少东西。由于狄更斯习惯以自己作为文学标杆,他无法完全认可柯林斯的写作观念。他要求柯林斯像他一样刻画人物,用各种喜剧因素和巧合事件来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却在不知不觉中压制了柯林斯在很多方面的文学天赋,尤其是他在叙事技巧和制造悬念方面的能力。难怪勒诺夫会有如下感

觉:“想要取悦于狄更斯的焦虑感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即便是在他最好的作品中,读者也可感受到某种未被充分实现的潜质。”(Lonoff, 157)前文说过,柯林斯生性放荡不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清规戒律根本不放在心上,在种族、性别和阶级观念上也比同时代人进步得多,但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越来越浓厚的道德保守主义倾向,这不能不说与狄更斯的“教导”有某种关系。

内德尔在认真研究过柯林斯和狄更斯之间的交往后指出,对前者来说,后者一直是其“成功的模本,以及他用来衡量和评价自己的收入和文学地位的标杆”(Nayder, 2001: 131)。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狄更斯也是柯林斯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不得不克服的心理障碍。至少在他创作《白衣女人》之时,他对狄更斯的任何建议都基本能够虚心接受。但随着《白衣女人》为他带来前所未有的收入和自信,他开始渐渐抵制来自“父亲”的“馈赠”。他在1861年与狄更斯的解约或许正是“儿子”要脱离“父亲”的前奏。1862年,当柯林斯在写作《无名》时,狄更斯一如既往地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在我看来,你应该加倍小心,别把故事讲得太严肃了……不时地来点插科打诨,调节一下紧张氛围……要是我的话,我会往本德瑞尔律师身上添加点喜剧因素。”(转引自 Allen, 38)然而柯林斯不但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反倒故意把这个人物的塑造得异常严肃呆板。狄更斯还为他拟定了近20个参考书名,也均被他一概否定。后来在他病重时也拒绝了狄更斯主动提出要帮他完成剩下内容的要求,因为已经独立的“儿子”不再希望“父亲”干涉他的事务。

四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狄更斯在与柯林斯的交往过程中,他的付出远超过所得。他得到的仅是一个可以让他身心放松的忘年交,付出的却是为提高后者的文学创作水平而耗费的大量心血。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柯林斯在帮助狄更斯料理繁杂的日常事务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忽略了他在狄更斯陷入个人感情危机时提供的精神支持,而这些对于狄更斯得以专心写作和运营杂志都是非常有益的。即便在文学创作上,柯林斯也并非单方受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狄更斯的两部公认的最成功作品,即《荒凉山庄》(*Bleak House*)和《双城记》,以及柯林斯的两部代表作,即《白衣女人》和《月亮宝石》,恰好都完成于两人关系最融洽的时期。狄更斯最擅长塑造人物,几乎每部小说都会留下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柯林斯最为人称道的是情节设

计,用错综复杂的叙事手法讲述离奇的故事并制造悬念,这也是其成为侦探小说之父的秘诀。但巧合的是,柯林斯在《白衣女人》中塑造出了一生最经典的女主角劳拉·菲尔利,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情节安排也被公认为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成功的。

人们每次提到《双城记》,都会把当时著名学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法国大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当作狄更斯最重要的灵感来源。毕竟狄更斯本人也在小说第一版的序言部分声称:“我的一个愿望是能够在人们理解那段糟糕岁月的常见生动方式之外,再为人们增添一点东西。虽然谁也不可能再给卡莱尔先生在其杰作中所表达的思想添加毫厘了。”^①很多人认为,狄更斯必定是先读过卡莱尔的著作之后才有了具体的写作计划。但正如米利的研究所表明的,其实柯林斯才是启发狄更斯创作《双城记》的主要灵感来源(Milley, 525-534)。正是在与他的业余剧团排练柯林斯编写的剧目《冰冻深渊》(*The Frozen Deep*, 1857)的过程中,狄更斯才突然想出要用“重生”作为下一部小说的叙事主题,也是在柯林斯的建议下,他才决定用法国大革命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虽然狄更斯对这段历史非常着迷,但从其以往的写作习惯来看,他更擅长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展开故事,若没有柯林斯的建议,他似乎不会选择法国大革命作为叙事背景。更为重要的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还大胆创新写作手法,尝试着把重心由人物塑造转移到讲述故事上。与《雾都孤儿》(*Oliver Twist*)等前期作品相比,《双城记》展示了狄更斯最丰富多变的叙事技巧,他不再依赖幽默和巧合来吸引读者,而是将倒叙、插叙、铺垫和预留伏笔等手法交替运用,终于成就了一部不朽杰作。

柯林斯曾说过:“我始终坚守着一条陈旧的观点,即一部小说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讲故事,并且我也从不认为如果一位作家恰当做到了这一点,他会因此而忽视人物刻画……”(转引自 Milley, 528)在两人交往最融洽的那段时间里,狄更斯对柯林斯的文学才能非常欣赏和信任,要不然他也不会让后者用《白衣女人》来接续他的《双城记》。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他在叙事手法上的改变必定是受到了柯林斯的影响,也有理由相信艾什雷所说的话:“柯林斯给予狄更斯的影响或许和狄更斯给他的影响一样巨大和有益。”(Ashley, 273)

然而,随着柯林斯日渐成熟,狄更斯也开始感受

到巨大的危机感。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柯林斯无论是在稿酬还是声望上都几乎不逊色于狄更斯,特别是他的《月亮宝石》在1867年连载于《一年到头》后,所创下的发行量竟然远远超过了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 1861)的总和。狄更斯作为“父亲”的威望开始受到“儿子”的严峻挑战!柯林斯已不再习惯于接受他的建议,他学会了反叛,并且要求“分割家产”——划清两人此前多部合著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于是我们看到,狄更斯与柯林斯之间的裂隙日渐加深,他也越来越难以认可后者的创作理念。与柯林斯在叙事手法上不断创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狄更斯自《双城记》之后却重新变得越来越保守,并且在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埃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1870)中还重拾了与《月亮宝石》中的多角度叙事完全相反的全知叙事方式。作者的声音时常越俎代庖地显现在小说叙事进程中,试图全面驾驭读者对信息的获取。这不能不说是狄更斯为了抵制来自柯林斯的“影响的焦虑”而做出的反叛。

自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两人之间的交往几乎中断,这其中绝不仅仅因为两人越来越差的身体状况。1870年1月,在柯林斯的多次要求下,狄更斯终于写信正式确认柯林斯拥有所有发表在他的刊物上的作品的著作权,而这也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耐人寻味的是,狄更斯在信的末尾写道:“我不去看望你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你。或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想见我了,谁知道呢?——你永远真挚的朋友。”(转引自 Adrian, 170)同年6月9日,狄更斯因病猝然离世。柯林斯得知消息后很震惊,抱病赶来参加了狄更斯的葬礼。虽然此后他又活了近20年,却再也没有写出一部重要作品。这与他为了缓解病痛而过量服用毒品有关,但或许更与他不再需要克服“影响的焦虑”有关。在此期间曾有出版商邀请他续写狄更斯未完成的《埃德温·德鲁德之谜》,也有人希望他能写一些与狄更斯有关的回忆录,但都被他回绝。

结语

随着柯林斯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日俱升,他与狄更斯之间的这段往事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不是出于对名人隐私的好奇心,而是因为他们的交往对各自的文学创作影响重大。这里面既有融洽的友情,也有密切的合作,更有影响的焦虑。两

^① 参见 Charles Dickens, Preface to *A Tale of Two Cities*. <http://www.enotes.com/tale-of-two-cities-text/pre-face>. (accessed 2012-5-10)

个人能够走到一起的原因似乎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性情和艺术创作方面的互补效应。但导致两人友情出现隔阂的原因却很复杂,仅仅归结为其间不幸的姻亲关系显然不够有说服力。近些年来,也有人从两人在阶级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来解释其关系破裂的原因(Nayder,2001)。这种解释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似乎有过度阐释之嫌。而以布鲁姆所说的文人之间的“影响的焦虑”为切入点,通过跟踪两人的关系伴随柯林斯文学成就的不断增长而变化的轨迹,让我们有机会从更贴近作家心灵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段友情。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 [1] Adrian, A. "A Note on the Dickens-Collins Friendship."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2 (1953): 211-213.
- [2] Allen, B. "More than Sensational: The Life & Art of Wilkie Collins." *The New Criterion*, 4 (1993): 31-40.
- [3] Ashley, R. "Wilkie Collins Reconsidered."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4 (1950): 265-273.
- [4] Lonoff, S. "Charles Dickens and Wilkie Collin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2 (1980): 150-170.
- [5] Milley, H. "Wilkie Collins and *A Tale of Two Cities*."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4 (1939): 525-534.
- [6] Nayder, L. *Unequal Partners: Charles Dickens, Wilkie Collins, and Victorian Authorship*. New York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7]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政治互文下的《比萨诗章》^①

郭英杰 王 文

摘要:《比萨诗章》是庞德《诗章》最引人瞩目和主题最有争议的部分,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政治性。虽然它是庞德精神遭受重创和打击,“痛定思痛”之后写成的“心灵教科书”,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互文式表达和反思。政治的隐形书写和癫狂表达就是庞德在《比萨诗章》中对其“痴”“狂”的政治的互文性解读。

Abstract: *The Pisan Cantos* is the most impressive and controversial part of Ezra Pound's *The Canto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lies in its political aspects. Though finished as a psychological “textbook” after Pound encountered spiritual blows and “recalled painful experiences”, *The Pisan Cantos* reveals specifically his intertextual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upon his political idealism and the reality. The metaphorical writing and demented expression between the lines are rightly Pound's intertextual representations of his “obsession” and “madness” for politics.

关键词: 庞德;《比萨诗章》;政治;互文

Key Words: Ezra Pound; *The Pisan Cantos*; politics; intertextuality

《诗章》(*The Cantos*)是大诗人伊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代表作,也是里程碑式的现代派诗歌巨著(杨金才, 2002: 64—65)。长期以来,其宏伟奇特的叙事结构和丰富庞杂的诗歌内容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14世纪但丁写就的《神曲》。但是,由于思想晦涩和“反动的”政治内容,《诗章》被不少批评家讨伐和诟病。庞德本人也由于“误入歧途”的政治倾向性成为20世纪西方诗坛最有争议的诗人。政治塑造了庞德和《诗章》,政治也使庞德和《诗章》长期陷于痛苦不堪的挣扎之中。查尔斯·伯恩斯坦(1998: 267—275)就毫不留情地把庞德当作靶子去“痛击法西斯主义”,说他在诗歌实践中表现出的“神秘化、美学化与权威化”不过是“盗用意识形态”的某种偏执逻辑。理查德·希伯特也指出,《诗章》的最大讽刺在于“所有无法协调的因素只能在抽象中”,依靠权威去执行。唐纳德·戴维更是在其专著《埃兹拉·庞德:作为雕刻家的诗人》中猛烈指责庞德《诗章》的“荒诞、不健全”(吴其尧, 2008: 80—85)。国内学者在宣传和关注庞德及《诗章》不朽价值和非凡艺术特色的同时,也有深入其政治本质、解

构其主旨和内涵的趋势。庞德研究专家孙宏与弟子李英(2011: 5—23)最近就撰文《为君主撰写教科书:埃兹拉·庞德对历史的曲用》,试图澄清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误解”,那就是《诗章》不是一部“现代的《神曲》”,而是酷似16世纪马基雅维利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梅第奇的《君主论》,是庞德通过曲用历史给墨索里尼“撰写教科书”,最终为法西斯“继续革命理论”正名。根据该研究,作为庞德《诗章》最引人瞩目和主题最丰富、集中的部分,《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也应该具有这种“教科书”的性质,虽然它是庞德精神遭受重创和打击,思想陷入困顿和迷离,既又“痛定思痛”之后写成的“心灵教科书”。况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庞德在《比萨诗章》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互文式表达和反思。

从本质上讲,《比萨诗章》确实是以互文(intertextuality)的形式存在并积极地使互文性发挥着作用,因为庞德通过“伟大的诗行”巧妙地把己一生的际遇、体验、忧思,融入他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前景的个人冥想之中(杨金才, 2002: 64—

^①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世纪中美诗歌的互文和戏仿性研究”(项目编号:10YJA752031)。

65)。无论是运思谋篇,还是内容设计,互文无疑是一个既显而易见又极具历史隐喻精神的客观存在。在这个充满隐喻精神的文本世界里,政治性因为自身特殊的存在方式和张力,成为《比萨诗章》诸多互文性主题当中比较突出和典型的一个,也是目前学术界皆有所感知、但是未深入挖掘和细致探讨的一个。笔者以政治互文为视角解读《比萨诗章》,旨在说明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比萨诗章》是政治的,因为《比萨诗章》直接影射了庞德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表达了他要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憧憬和期待;第二,《比萨诗章》又是互文的,因为《比萨诗章》建构在前人的历史经验、认知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尤其融合了多个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成为彰显庞德主题思想的源泉。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庞德的政治互文性,一方面以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方式存在,因为隐而不显,所以自然具有隐性书写的特质;另一方面以破碎性(fragmentation)的风格呈现出来,在诗人借助“癫狂的形式”试图颠覆西方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孙宏、李英,2011: 8—9),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他本人为“你”(即政治)痴、狂的本质。

一、为“你”痴:政治的隐形书写

庞德是关心政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他把关心政治视为一种精神需要。他总是以倔强的方式和个性化的做法参与到政治实践中,并且通过隐性书写隐喻式地影射他的思想和意图。这不仅反映在他的《地狱诗章》(诗章14—15)、《中国诗章》(诗章56—61)、《亚当斯诗章》(诗章62—71),而且反映在他深陷囹圄时创作的《比萨诗章》(诗章74—84)里。透过《比萨诗章》的精神实质,我们可以断定:经历了磨难后的庞德,对政治的追求仍然痴心不改。

《比萨诗章》一开篇,庞德写道:“梦想的巨大悲剧在农夫弯曲的/双肩/梅恩斯! /……/蛆虫们该去啃死公牛/狄俄倪索斯呀,可是这死两回。”这明显是庞德有所指的隐形书写,文字中蕴含着他的言外之意。庞德到底持有什么样的梦想,会使他怀着悲伤的心情来纪念一个特别的“悲剧”,而且是“巨大的悲剧”? 蛆虫们该去啃的公牛是谁? 要读懂庞德的本意,这里需明确两个典故:一个是梅恩斯(Manes, 216—276),他是波斯先知和摩尼教的创始人,死后尸

体被抽打,并被挂于城门示众;另一个是狄俄倪索斯(Dionysus),他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母亲塞墨勒受赫拉迫害被闪电杀死,父亲宙斯把他从母腹中取出,缝进自己的身体里,使其二次出生(1)。① 这两个典故在婉转地指涉墨索里尼,因为墨索里尼(及其情妇克莱拉)在1945年4月27日去往阿尔卑斯河谷瓦尔泰利纳地区时被反法西斯游击队俘虏,并于次日被游击队员处死,他们的尸体随后在4月29日被运到米兰,并被倒挂在洛雷托广场(Piazzale Loreto)的一个加油站顶上示众。② 很明显,庞德这里对墨索里尼的死流露出极度的伤心并对其死后离奇的遭遇示以纪念和同情,而且试图说明:墨索里尼的死不是真正的死,其实意味着一种重生。不仅如此,第七十八章“萨罗梦想共和国”(102—103),第八十章“尼格斯不是坏蛋”(162),第八十二章“没见到斯温伯恩是我唯一的遗憾”(186),第八十四章“巴尔扎克已离开了我们”(210)等,都是在含沙射影地“祭奠”墨索里尼,并且用具有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公牛喻指他。庞德始终认为墨索里尼的死是历史的“巨大悲剧”,他的死也预示着自己梦想的最终破灭。这种隐喻式的抒怀“反映了庞德的亲意大利法西斯立场”(1)。庞德为什么会走上亲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并且对墨索里尼怀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呢? 这与他的政治理想息息相关。20世纪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美国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美国民众普遍感到信用危机、信仰危机、心灵腐化。与此同时,由于人性异化导致的失业、贫困、两极分化、高利贷等促使在美国出现了艾略特的《荒原》里所描摹的“荒芜”景象。庞德对此极为痛心。他想寻求救国救民、乃至拯救全世界的良药。为此,他“参与了早期运动派的非凡岁月,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经济是引起全球矛盾和解决全球矛盾的关键因素。”(Wilson, 2005)他渴望“仁者”的出现,希望美国再次拥有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英明的领袖。为此,于20世纪30年代,他对社会的经济改革充满渴望并且立志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发表了大量的信件、文章和电台讲话,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政治、民生的关注。他也在“流亡”海外期间返回美国劝说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实施仁政,遏制战争和高利贷剥削,建立大同世界。他还试图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在纽约遭到拒绝。从此,心灰意懒的庞德不再对美国抱有幻想,转而回到欧洲寻找他梦寐以求的伟大领

① 本文所使用的诗歌文本是:〔美〕伊兹拉·庞德著,黄运特译,张子清校,《庞德诗选·比萨诗章》,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该文本的引文页码在本文中均置于括弧中,不另作注。

② 参见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93527707.html>. (accessed 2012-3-12)

袖。他找到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我唯一一次接近墨索里尼时给他提了18个问题。他在下一次发表重要演讲时把我所有的问题浓缩成了一个陈述句：经济秩序是社会的基础。”(Pratt, 2007: 147) 庞德认为墨索里尼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而且在意大利还亲身感受这位“仁者”短时间内创造的奇迹: “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减少了赤字, 平衡了预算, 改善了罢工频繁、效率低下的铁路, 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Sonnenberg, 1998: 198) “意大利从没有这么团结过……法西斯主义消除了议会内部的对弈游戏; 它简化了税制, 将赤字减少到了可计量的范围; 它极大改善了公共服务, 尤其是在铁路方面; 它缩减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而且没有造成生活困难或失业等不良后果; 它奉行一种充满活力且相当成功的殖民政策。”(Beasley, 2007: 201-202) 庞德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导致他对墨索里尼倡导的法西斯政治深信不疑。一方面, 他把墨索里尼与杰斐逊相提并论(如他1935年的书名干脆题为《杰斐逊与/或墨索里尼》), 声称: “我个人对墨索里尼评价极高, 假如有人把他和美国总统(最近三任)或英国首相之流比较, 实际上就是在侮辱他。”(Pound, 1982: 205) 另一方面, 他把墨索里尼倡导的法西斯主义和英、法、德等国的老牌经济体制, 甚至和罗斯福新政相比, 认为对社会和国家能够做出巨大贡献的“更好的保证和解决方法是法西斯主义”(孙宜学, 2008: 359)。同时, 出于欧洲形势的需要和急于“拿出一套在即将到来的危机降临时”为墨索里尼政府“提供导向的材料”, 庞德凭借个人渊博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完成了《诗章》的种种章节, 并把它“视为直接干预政治的手段”, 成为为君主撰写的教科书(孙宏、李英, 2011: 11)。所以, 庞德在《诗章》中通过呈现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如杰斐逊、亚当斯、尧、舜、禹、孔子、孟子等)的嘉言懿行, “以期用他们作为人类文化的精英去陶冶人民, 改造社会, 建立一个政府仁道地掌握金融、取消私人高利贷盘剥、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的理想国家”(张子清, 1998: 3)。“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被墨索里尼法西斯式的“社会主义”所迷惑的庞德, 深信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是高利贷剥削。而要把高利贷剥削从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 则要最终把矛头指向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作为虚伪的化身”是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当中最“神秘、模棱两可或不可知的”部分, 是“无根无末、破坏捣乱的群体, 腐蚀以家园、自然与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农庄思想”, 并试图“歪曲、篡改、掩盖语言, ‘阉割’文学、本源与传统, 语言中的抽象、晦涩、冗长、含糊、歧义和隐喻大多是由他们引进的”(查尔斯·伯恩斯坦, 1998:

270)。这就衍生了庞德的反犹太主义。庞德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在《比萨诗章》有许多隐形书写的内容, 不过这些隐形书写的内容最终以互文的形式“暴露”为一种宣泄、谩骂和侮辱。这里举一例: 在第七十六章, 庞德写道: “可怜的魔鬼/可怜的魔鬼去见屠夫/奴隶对奴隶/在闷鼓声中, 去吃残羹剩饭/用一个高利贷者的节日去转换/货币的价格/转换……”(75) 接着在第七十八章, 庞德厉声吼道: “恶根在于高利贷和转换货币/……/‘对于一头猪’……对于放/高利贷的/丑行”(110—111), 要连人与他们“常见的肮脏勾当”一起除掉。这与第七十四章庞德的歇斯底里的叫嚷相呼应: “从他们的椅子上, 那些金发兔崽子们, 把他们/扔出去。/犹太人是兴奋剂, 非犹太人大部分/是畜牲, 乖乖地被宰了/很好卖。”(33)

二、为“你”狂：政治的癫狂表达

评论界普遍认为: 庞德的破碎性艺术手法建构在他所提倡的“日日新”(Make It New)的文本策略的基础之上, 是他现代性风格的展开, 是一种故意而为之的写作模式(杨金才, 2002; 张子清, 1998)。这在他倡导的“意象派三原则”和“漩涡主义诗歌理论”当中有明显的反映。但是, 抛开这种静止和固化的惯性思维, 反观历史背景, 重新审视《诗章》的创作历程, 从文学性与政治性结合的动态视角考察《比萨诗章》在《诗章》中的特殊位置, 我们就会发现《比萨诗章》与《中国诗章》、《亚当斯诗章》等前期创作的诗歌, 在风格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与先前他倡导的“日日新”的策略无关, 而是或隐或显地流露着一种难以言说却又不得不一吐为快的癫狂。换言之, 破碎性的艺术手法在《比萨诗章》里可以被视为庞德对政治的一种癫狂的表达方式, 这种癫狂源于他“分裂”和异化的精神世界。他疯子般(查尔斯·伯恩斯坦, 1998; Pratt, 2007)支离破碎的语言、杂乱无章的逻辑思维和断裂幻化的“多声部”叙述就是他对政治癫狂表达的最好诠释。

首先, 他对政治的癫狂表达反映在他疯子般支离破碎的语言方面。正如前文所论述的, 《比萨诗章》是庞德入狱之后经过痛苦的挣扎和艰难的反思写成的诗歌。那时墨索里尼死了, 庞德就认为自己失去了可以与之进行政治对话的“仁者”, 所以“他伤心至极”, “仿如一只孤独的蚂蚁爬离崩塌的蚁山/爬离欧洲的残骸”(68—69)。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痛楚的记忆里和现实的煎熬中写“遗言”(吴其尧, 2008: 84)。他的“遗言”如他创造的意象一样支离破碎, “某些意象在脑中形成/留在那里”(46), 然后就突然

变成政治碎片,“不知为什么”。比如庞德心中英武的“小猫头鹰”:“小猫头鹰,闪亮的眼睛,/橄榄树/闪亮然后又不闪亮/当叶子在空中翻动/北风、东风、南风/‘有妖怪’……”他自己也承认那“支离破碎”的语言有时唐突而又让人匪夷所思:“那树行间的塔/柏林 痢疾 磷/老实人的老婆/(你好凯西下土)两个叉还是搞官僚?/天堂不是人造的/却显然支离破碎”(29—30)。他有时不说“支离破碎”的话,因为怕惊醒了他的梦和他梦中的“仁者”:“睡去吧,”“从律法,据律法,去造你的庙宇吧”(34),“那是猫躲在木架棚里/国家不必借钱”(35)。他有时又想与心中的“仁者”交流,热情地展示他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抱负,不过语言依然支离破碎:“两个最大的骗局/是转换货币值/(货币的单位,转换货币)/以60%的高利或借贷/……/国家可以贷款……国家不必借钱”(34—35)。可惜“仁者”对这种言语不感兴趣,他只能自己唱独角戏。墨索里尼的生死对庞德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他梦想中的理想政治和经济体制本是依靠墨索里尼那样的“仁者”去实现的。可是,“诚实的人”(70),“你在哪里?”庞德总是疯子般地说着他的臆语。张子清教授说:“庞德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张子清,1998:2)事实确实如此。庞德在入狱前就吃过疯子般语言的苦头。他曾经为协助墨索里尼倡导法西斯,多次公开在意大利电台胡言乱语,一方面让美国司法部宣判他犯了叛国罪,另一方面让意大利官员怀疑他是美国军方派去的特务。他癫狂的语言对他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让人心酸的是,庞德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癫狂的语言招致的政治错误以及该政治错误所承载的负荷,或者说他认为即使自己犯了什么语言错误也不过是小错误,如他在第八十章开篇所说:“没犯啥联邦罪,/就干了点儿小坏事而已。”(131)“我没干什么不必要的手工劳动”(6)。梦魇般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加剧了庞德支离破碎语言的规模化。在记忆中,“黑鬼们在不远处/爬栏杆”(21),“只有栏杆,一个对踵点/至于位于此间的稳健的白牛/或许只有威廉斯大夫(比尔·卡洛斯)/懂得其重要性和/祝福……/月亮分裂了”(113)。“死亡的种子移动在岁月里/移动的种子/落回到海槽里/月亮的屁股这回给啃掉了”(145)。幸好“月亮分裂”和“死亡的种子移动”的时候,他有一部《四书》和一本中文词典陪伴左右,加上过去一些美好的往事(如回忆他的妻子多罗西、女儿玛丽、儿子奥尔格等)、比萨监狱狱友的亲情和对生命的渴望给他以慰藉、信心和希望,才使他大难不死。

其次,他对政治的癫狂表达反映在他杂乱无章的逻辑思维方面。比萨监狱的恶劣环境对庞德的身

心都是摧残和考验。本来他的精神经过沉重打击,应该及时得以救助,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表现,反法西斯队伍丝毫没有对他心慈手软。“大家都说好景不长”(62,63)。庞德的精神是糟糕透顶的,所以逻辑思维只能在过去的政治回忆、美好的政治幻想和残酷的政治现实之中游走,与前期生机勃勃的状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时的他还继续关心战事和时局的变化,“战争向西线发展/西线无战事/宪法濒临危机/现况亦无新动向/‘蓝宝石者,此石能催眠’”(6),但是内心的矛盾和杂乱无章的逻辑,却使他判若两人,《比萨诗章》第八十二章说“不认识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193)。他保留了尼采当年宣称“上帝死了”的疯狂。他想到过“怨恨”、“死亡”、“疯狂”和“自杀颓废”,但是,他又想澄清一个事实:“此间不含怨恨/死亡,疯狂/自杀颓废/就是说,人愈老愈愚蠢/历尽磨难”(64—65),“别的都无关紧要/除了情感的质量——/最终——在脑幕上刻下痕迹/记忆不灭的地方”(65)。这“记忆不灭的地方”也是庞德逻辑思维产生混乱的地方,更是他因为不能实现政治理想而倍感痛苦的地方。庞德哭泣过多次,他的哭泣与他的思维逻辑一样混乱和莫名其妙。据笔者初步统计,庞德在《比萨诗章》里毫无理由的“哭泣”场面就出现了十多次(见第十四页、第六十九页、第一百六十九页、第一百九十三页、第二百零一页等)。这种“多愁善感”与他被关进比萨监狱前倔强的个性形成强烈的反差。好些人(包括庞德同时代的人)对他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和逻辑出现“险情”表示怀疑,因为他毕竟完成了《比萨诗章》这样“复杂”的文字(Pratt,2008:359)。带着这些疑问,美国陪审团在对庞德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测试后,结果证实他的“精神确实不健全”,并由法庭判决送到华盛顿市圣伊丽莎白精神医院治疗。这时期,庞德继续写诗歌,如《王座》等,但是在逻辑方面“更加混乱”,因此招致众多后辈诗人对他口诛笔伐。反映最为强烈的是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和汤姆·甘。“我绝不崇拜被称为‘本世纪最伟大诗人’的那个人”,因为他的诗同他的政治主张一样“毫无组织”,“思想混乱,不知所云”(吴其尧,2008:85)。笔者细读《比萨诗章》后也深有感触:虽然庞德“神游万仞,心骛八极”,但是在他夸张的语言背后潜伏着“跌宕起伏”的“神秘、模棱两可或不可知的东西”(查尔斯·伯恩斯坦,1998:271)。这其中,他诗歌里各种杂乱无章的政治片断和零乱的逻辑就是证明。“凡事有始有终”(74,78),庞德不断告诫自己,但是“在天堂吾谁与归?”(61)他似乎还未完全从政治的噩梦中清醒过来,还在苦苦挣扎:“这些是灵魂?肉身?/实感绝不

等于升天”(68);“天堂不是人造的,地狱也不是。”(70)

再者,他对政治的癫狂表达反映在他断裂幻化的“多声部”叙述层面。《比萨诗章》里有许多断裂幻化的“多声部”叙述,这些叙述“充满非确定性、碎片化、抽象化、晦涩、冗长、含糊、歧义和隐喻”,是出于政治欲望的考虑和安排(查尔斯·伯恩斯坦,1998: 271;杰夫·特威切尔,1998: 277—299)。比如用第一人称的“我”或“我们”直抒胸臆,表达对理想政治社会的渴望:“我:比德国人还差吗?”(214),“我愿意相信美国人”(214),“我们的‘中’(chung)/对此我们顶礼/膜拜”(213),“我们还不能翻过那一章/天堂不是人造的”(85);用第二人称“你”(或“汝”)和“你们”充当某种神秘力量、君王或某些特定的政治家:“你是一个支撑肉体的小灵魂”(81),“汝曾否找到一片云 如此轻飘”(182),“扯下汝之虚荣,乃非人/造就勇气,或造就秩序,或造就恩典”(183);用第三人称“他”、“它”、“他们”等进行客观白描:“他叫什么来着,/是不是老军校?/‘他看起来,’他的门房说/‘像一位伪装的牧师’”(153),“老杰克逊对他说:/‘祝贺您。’/无政府主义是政府的真正形式”(151),“他最后进了罗马教廷/汉尼拔们,哈米尔卡们”(148)。有时,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一起出现,表达一种玄妙的意念:“我们想起他/死者与生者/世界能否重循旧轨?/非常神秘地,我问你:它能吗?”(57)。他的诗歌有意识流式的呈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意识流。因为他的逻辑不像前期那样,有较明朗的脉络或线索:他要么变换人称对某些事闭口不谈,要么转换视角对某些事随意篡改。庞德深陷图囿,在死囚牢里仰望泰山,他活在记忆里,活在往事中,所以他断裂幻化的“多声部”叙述常常像脱缰的野马跨越时空,穿越历史:“惠特曼喜欢牡蛎/至少我想是牡蛎/云层叠成一座假维苏威/泰山此侧/内尼,内尼,谁能继位?/‘这样的洁白里,’曾子说/‘你们还能添加什么白色?’”(136)这短短几行涉及美国的“惠特曼”、意大利的“内尼”,还有中国的“曾子”,他们横跨美洲、欧洲和亚洲,而且在时间跨度上影射了19世纪、20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庞德因为幻化的“多声部”造成“诗的结构支离破碎度太大”(张子清,1998: 4),给普通读者的阅读带来重重障碍。虽然庞德是一位很擅长给政治作注的高手,虽然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嫁接”给现实,并且通过借用历史人物和典故与自己的政治经济理想“联姻”,但是他癫狂的本质还是依然如故:他因为深深陷入政治的漩涡而时不时地感到莫名的痛苦和折磨。作为墨索里尼狂热的信徒和法西斯社会主义的

守望者,庞德或许永远不会明白自己的梦想为什么会破灭。“我不知道人性如何承受/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26)从某种意义上说,庞德只能是一名诗人,他成为不了政治家。正如有的评论家总结的那样:“庞德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书生,他不可能成为政治家,因为他缺乏政治家的那份对现实政治的敏感和对政治如何运作的判断。”(王翠萍,2010: 111—115)

三、结语

庞德在《诗章》最后部分(1969年出版时题为《草稿和残篇》)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似乎仍然眷恋他心中的“仁者”墨索里尼,不过无奈之中饱含一种凄凉:“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什么/你在哪里?/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一个个梦想碰得粉碎/撒得到处都是——/而我曾试图建立一个地球上的/乐园。”(杰夫·特威切尔-沃斯,1998: 299)这是他自相矛盾且又乏力无助的精神世界的生动表达,并与他落魄的现实生活形成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迂回在他幻灭的人生与残酷的现实、宏伟的抱负与可怕的政治之间无休止的“黑暗丛林”(查尔斯·伯恩斯坦,1998: 267—275)游戏里。庞德是这个政治“黑暗丛林”游戏的牺牲品。尽管庞德死也不愿相信他所崇拜的仁者确实已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他所绘制的政治、经济蓝图已随着法西斯的旋风无情地远去,但是,他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悲凉的社会现实:他在政治实践的道路上被撞得头破血流,他“疯癫”了,也“痴狂”了,他的政治理想最终也随之破灭了。这从《比萨诗章》可以得到验证。而且通过《比萨诗章》,我们会发现庞德确实已通过他特殊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解读他政治互文性的一把钥匙。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 [1] Beasley, Rebecca. *Ezra Pound and the Visual Culture of Moder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Pound, Ezra. "Letter to Harriet Monroe." (30 Nov., 1926)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 Ed. D. D. Paig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2.
- [3] Pratt, William. *Ezra Pound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sm*. New York: AMS Press, inc.,